

中国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二元分布与决定因素研究

赵钰宁^{1,2}, 牛云河³

(1. 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云南 昆明 650091;
2. 西南联合研究生院, 云南 昆明 650092; 3. 云南师范大学地理学部, 云南 昆明 650500)

摘要: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载体, 也是中华文明地域传承的重要根基。本文以国家级非遗项目为样本, 聚焦汉族与少数民族非遗的空间分异特征, 以地理本性为核心构建分析框架与理论假说, 通过统计检验其离散集聚特征, 并运用空间自相关—Logistic 回归 (SAR-LR) 模型, 实证分析二元分布的地理本性决定因素。研究发现: 汉族非遗依托地理本性, 集中分布于自然条件优越、经济发达的华北平原与长江中下游平原; 少数民族非遗则依托地理本性的地域维度, 集聚于远离政治中心的边疆及边远区域, 二者分布重心因地理本性差异显著分离, 形成鲜明二元集聚格局。计量分析表明, 空间相邻集聚、纬度、离政治中心距离等地理本底要素, 与少数民族人口比重、产业结构水平等生产性地理本性联合作用, 既体现非遗二元分布顺应地理规律的必然性, 也反映地理空间对文化存续的深层制约。研究揭示的非遗空间分布自然—历史演化逻辑与国家战略塑造作用, 丰富了非遗空间研究的理论维度, 为强化少数民族非遗地理本底保护、促进各民族文化互鉴、构建多元共生的文化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提供了实证支撑与理论参考。

关键词: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汉少非遗二元分布; 空间自相关与 Logistic 回归 (SAR-LR) 模型; 决定因素; 地理本性

中图分类号: K901. 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 - 0566 (2026) 05 - 0069 - 13

Study on the binary distribution and determinants of China's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tems

ZHAO Yuning^{1,2}, NIU Yunhe³

(1. Research Center for Ethnic Minorities in Southwest Borderland,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1, China;
2. Southwest United Graduate School, Kunming 650092, China;
3. Faculty of Geography,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 China)

Abstract: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CH) is a core carrier for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and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the regional inheritanc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aking national ICH projects as sample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ICH between the Han and ethnic minorities, construct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and theoretical hypotheses centered on geographical nature, statistically tests their discrete and agglomer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geographical nature determinants of the binary distribution using the Spatial Autocorrelation-Logistic Regression (SAR-LR) model. The study finds that Han

作者简介: 赵钰宁 (1996—), 女, 云南昆明人, 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西南联合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与传承。通信作者: 牛云河。

ICH, based on geographical nature, is concentrated in the North China Plain and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Plain with superior natural conditions and developed economies; ethnic minority ICH, relying on the regional dimension of geographical nature, agglomerates in borderland and remote areas far from political centers. The distribution centers of the two are significantly separated due to differences in geographical nature, forming a distinct binary agglomeration pattern. Econometric analysis shows that geographical background factors such as spatial adjacent agglomeration, latitude, and distance from political centers, combined with productive geographical nature factors including the proportion of ethnic minority population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level, not only reflect the inevitability of the binary distribution of ICH conforming to geographical laws, but also reveal the deep constraints of geographical space on cultural survival. The natural-historical evolutionary logic of ICH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the shaping role of national strategies revealed by this study enrich the theoretical dimensions of ICH spatial research, providing empirical support and theoretical references for strengthen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geographical background of ethnic minority ICH, promoting cultural exchanges and mutual learning among all ethnic groups, building a culturally diverse and symbiotic community, and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jects; binary distribution of ICH between Han and ethnic minorities; Spatial Autocorrelation-Logistic Regression (SAR-LR) model; determinants; geographical nature

文化的生成与演化始终深嵌于特定的时空维度之中。黑格尔^[1]在《历史哲学》中指出,“助成民族精神的产生的那种自然的联系,就是地理的基础”。这一观点揭示了地理环境对文化形态的底层塑造作用。前工业社会中,地理环境通过决定生计方式,进一步影响经济文化类型、社会形态与价值观念,最终形成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体系。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文化多元荟萃的特征尤为鲜明。顾颉刚先生^[2]曾强调,“中国文化”并非中原文化一枝独秀,而是各民族文化相互吸纳、彼此滋养的博大体系,边疆民族的游牧文明、高原文明等均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既源于各民族在历史长河中的交往交融,也与不同地域的地理环境紧密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民族文化的活态载体,正是这一格局最直观的呈现。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多次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高度阐述其核心价值。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明确提出“我们的灿烂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强调要通过保护传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3]。同年,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要加强对国粹传承和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的支持和扶持,加强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4],凸显了少数民族非遗在文化传承与民族凝聚中的特殊意义。2025年3月在贵州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要求在保护有形文化遗产的同时,推动非遗“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民族特色在利用中更加鲜亮”^[5]。这些重要论述,不仅为非遗保护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也揭示了非遗分布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建构之间的深层关联。

从实践来看,我国已建立国家、省、市、县四级非遗名录体系,从根本上讲就是由国家主导的知识谱系^[6]。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以下简称“非遗”)是知识谱系的核心组成部分。截至2021年6月已公布5批共3610项,覆盖55个少数民族,形成了兼具代表性与系统性的文化资源图谱。值得注意的是,少数民族人口仅占全国总人口的8.89%(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计算),而其国家级非遗项目数占比却达30.89%。这种人口占比与项目占比的非对称分布,既体现了国家对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的政策倾斜,也暗示了非遗分布背后复杂的地理、历史与民族因素。然而,现有研究仍存在明显局限:一方面,多数研究聚焦单一区域(如长三角、黄河流域)或单一类型(如体育类、民俗类)非遗的空间分布,缺乏对全

国范围内汉族与少数民族非遗“二元分布”的整体审视;另一方面,既有成果多采用传统统计方法或普通回归模型分析影响因素,未能充分考虑非遗对地理空间的依赖性与异质性,难以精准揭示地理因子如何作用于汉族与少数民族非遗二元分布这一核心问题。

当前,随着人口流动与文化互动的加强,我国民族文化呈现“大流动、大融居”的新特征,但汉族与少数民族文化在空间上仍存在一定边界,甚至形成“多中心—多外围”的空间结构。这种结构在国家级非遗的二元离散分布中得到直接印证。那么,这种二元分布的空间格局具体呈现何种特征?地理环境、历史传承、政策支持等因素如何共同影响其形成?空间溢出效应在其中又扮演何种角色?回答这些问题,不仅有助于完善非遗保护的空间策略,更能从地理视角深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解,通过揭示汉族与少数民族非遗的分布规律,明晰二者的共生关系,可为强化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实证支撑。

基于此,本文以国家级非遗项目为研究对象,将其划分为少数民族(赋值1)与汉族(赋值0)二元变量,运用空间自相关与空间 Logistic 回归(spatial autocorrelation and logistic regression, SAR-LR)模型,重点探究三方面问题:一是汉族与少数民族国家级非遗项目的空间集聚分布特征;二是影响非遗二元分布的关键因素,尤其是地理因子的作用机制;三是空间溢出效应在非遗分布中的具体表现,为构建更具针对性的非遗保护传承体系提供科学依据。

一、文献综述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是文化地理学、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的核心议题之一。既有研究已构建多尺度、多类型的分析框架。本文从研究对象、数据来源、分析方法、核心结论4个维度梳理现有文献,进而明确本研究的创新边际。

(一)研究对象

既有国家级非遗空间格局研究,在考察对象上呈现出清晰的层级拓展特征,依次覆盖全域、区

域、类别与传承主体等多个层面。现有研究多以全国范围内的国家级非遗为考察对象,构建宏观层面的空间格局分析体系。程乾等^[7]率先揭示全国非遗的集聚特征与地理驱动逻辑;徐柏翠等^[8]补充政策因素的作用机制;张舟等^[9]整合多批次名录数据完成格局更新。这类研究为非遗空间分析奠定基础,但未对项目的族群文化属性进行区分。从区域尺度,研究可分为行政区域与文化地理单元两类。行政区域层面,邓凯等^[10]、李继晓等^[11]、张芳芳等^[12]、应奎^[13]分别剖析安徽、青海、新疆和贵州的非遗分布,其中青海、贵州等民族地区的研究虽隐含族群因素,但未进行系统区分;文化地理单元层面,王磊等^[14]、王红等^[15]、朱少锋^[16]聚焦黄河、长江流域(地区),焦敏等^[17]、梅大伟等^[18]围绕大运河文化带展开探讨;甘晓静等^[19]以流域为空间单元,探析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不同流域的时空分布特征。这些研究均以自然或文化廊道为边界,而非民族属性。从类别尺度,针对特定类型非遗的研究逐步深化,如体育类^[20-22]、传统美术类^[23]、民俗类^[24],研究发现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是体育、民俗类非遗的次集聚区。从传承主体尺度,余聿莹^[25]关注少数民族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空间分布,苏勇军等^[26]分析浙江非遗传承人格局,此类研究体现遗产与人的耦合分析。

(二)分析数据

随着研究不断深入,数据来源也从零散无序逐步走向规范统一,并进一步实现多源数据的融合应用。程乾等^[7]、李军阳等^[20]依托前两批国家级非遗名录开展研究,数据覆盖度不足,且未涉及族群属性的信息记录,难以反映非遗族群构成的整体格局。郭宇等^[27]发布的中国五批3610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分布数据集,为后续研究提供统一的数据基准;李嘉欣等^[28]基于该数据集完成非遗时空格局与谱系年代分析;张舟等^[9]实现多批次名录的整合更新,该数据集虽包含非遗的地域与类型信息,但没有对非遗项目的民族属性进行标识。近期,李晓婧等^[29]引入百度指数补充非遗网络关注度数据;张克新等^[30]整合地理环境、社会经济多维度数据完成影响因素探测;代

刚等^[22]拓展 2006—2021 年时序数据实现动态追踪。多源数据丰富了研究维度,但未补充少数民族属性相关的特色数据。

(三) 分析方法

从传统空间分析到地理探测,现有研究的方法体系以空间分析为核心,融合多学科量化技术。传统空间分析方法包括核密度估计、空间自相关、重心迁移模型,是主流工具。程乾等^[7]、徐柏翠等^[8]通过此类方法识别非遗集聚区域,章永林^[31]运用重心模型分析东北地区非遗时空演变。随后,地理探测器的应用实现影响因素的精准识别,张克新等^[30]通过因子探测器与交互探测器,揭示各驱动因子的独立与协同效应;代刚等^[22]则引入空间计量模型,分析区域战略对体育非遗分布的影响。近期,跨学科融合方法被采用,李嘉欣等^[28]结合谱系年代学构建非遗时空演化谱系;李晓婧等^[29]运用地理加权回归(GWR)分析网络关注度的空间异质性,拓展了研究视角。

(四) 核心结论

现有研究已提炼国家级非遗分布的共性影响因素,并识别部分区域与类型的差异化特征。共性影响因素方面,现有研究普遍认为,非遗分布受 4 类因素驱动:一是地理环境因素,程乾等^[7]证实河流与地形是核心地理因子;二是人文历史因素,王磊等^[14]强调黄河流域文化积淀的关键作用;三是社会经济因素(经济发展水平、文旅开发强度),张舟等^[9]指出文旅融合对非遗集聚的催化效应;四是政策制度因素,张克新等^[30]验证保护政策的强解释力。在差异化因素方面,田玉霞等^[32]发现新疆非遗集中于南疆民族聚居区,应奎等^[13]指出贵州非遗集聚于黔东南少数民族自治州。在类别上,代刚等^[22]揭示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是体育非遗的次集聚区,鄢慧丽等^[24]证实民俗类非遗与民族聚居区高度耦合。

综上所述,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特定地域文化空间的历史产物,其生成与存续既受地理空间的结构约束,亦与地方文化生态及实践活动深度耦合。既有文献表明,尽管现代开放环境下非遗呈现出一定流动性,但其空间分布仍表现出稳

健的地理根植性,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与集聚特征。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民族文化精神的核心表征,其分布格局的解析对非遗活态传承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价值。然而,当前研究尚未对国家级少数民族非遗给予足够关注,且多停留在地理探测器、空间自相关等描述性统计分析层面,缺乏基于计量模型的空间效应与影响因素的系统性识别;同时,既有研究未构建“汉族—少数民族”二元离散分类框架,也未完成非遗项目的族群属性标注,难以支撑精准的离散分布分析与差异化影响机制的揭示。基于此,本文通过构建国家级非遗的二元离散分类体系、重构族群属性数据、适配二元数据特征的计量模型,实现对现有研究局限的突破,为民族地区非遗的精准保护与差异化施策提供理论支撑。

二、理论假说

我国幅员辽阔,涵盖多个气候带和地形区,地理条件、气候生态、资源禀赋多样性,不同区域汉族和少数民族形成了不同的国家级非遗集聚区。国家级非遗的空间分布是第一地理本性(自然禀赋)、第二地理本性(人类活动改造)、第三地理本性(内生空间关系)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第一地理本性奠定非遗空间分布的基础格局,第二地理本性通过人类活动对基础格局进行改造与重塑,第三地理本性则从内生层面形成非遗存续与再生的内生动力。地理本性决定了当前少数民族与汉族国家级非遗呈现出二元离散的空间分布格局。

(一) 第一地理本性

第一地理本性是独立于人类活动、相对稳定的自然要素集合,包括海拔、地表崎岖度、水资源、气候、地理位置等,通过形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文化结构,营造出不同民族文化的孕育环境,对非遗的形成、传承与空间分布产生基础性、决定性影响,进而决定国家级非遗项目的初始分布差异。Krugman^[33]的地理本性理论指出,第一本性是区域发展的先天自然禀赋,是其他地方无法复制的本质特征。夏海斌等^[34]研究表明,第一本性地理要

素决定了中国农业的空间锁定(如秦岭—淮河线和长城一线),这一规律同样适用于非遗分布。西南山区封闭地形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作用已被多项研究所证实,如藏羌彝走廊非遗的空间集聚性特征与地形封闭度呈显著正相关。

地形、气候、水文等自然要素,共同促成汉族与少数民族国家级非遗的空间分布格局,进一步夯实了第一地理本性的基础性作用。我国西南与西北区域地貌类型复杂,天然形成文化地理阻隔屏障,有力促进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其聚居地域呈现高密度集聚格局;而平原、河谷等开阔连通的地形,作为汉族农耕文明的核心分布区,为汉族非遗的广域覆盖提供了有力支撑,二者在空间上因地形边界形成显著分异。湿润半湿润季风气候与汉族农耕类非遗高度适配,使其在农业核心区呈现连片分布特征;干旱半干旱、高原寒带气候则与少数民族游牧、狩猎及特色手工艺类非遗相契合,因气候生态系统的分异形成类型主导的空间离散。相较于汉族非遗,少数民族非遗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性更强,而汉族非遗对环境的适应性更具灵活性,这一差异进一步拉大了二者的分布差距。长江、黄河干流核心河段因交通便利、人口集聚,推动汉族非遗广域连片分布,支流上游等偏远流域则以少数民族非遗为主,形成“核心—边缘”离散格局,东部密集水网进一步强化了这种二元分布特征。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说1:第一地理本性决定少数民族与汉族国家级非遗的基础空间离散格局。

(二)第二地理本性

在第一地理本性的底层约束下,人类活动塑造的人文地理格局进一步放大非遗的离散分布,形成“文化—社会”维度的分异特征。其核心涵盖人口分布、民族聚居模式、生产方式、历史文化脉络等要素,通过调整人类文化互动的强度与模式,对非遗的生成、传播与集聚发挥改造性、驱动性作用,动态重塑非遗的空间分布格局。吴福象等^[35]的研究表明,第二本性是突破第一本性约束的关键力量,这一结论同样适用于非遗分布,人口迁移、文化交流等人类活动,重构了自然地理设定的

非遗初始分布格局;李锦等^[36]对青藏高原非遗的研究也证实,民族聚居度是决定少数民族非遗分布密度的核心因素,且与非遗项目数量呈显著正相关。

第二地理本性通过多元人文要素的综合作用,对非遗离散格局形成独立固化效应,承接第一地理本性的基础作用并进一步强化二元分异。其中,民族聚居模式主导圈层式离散,少数民族聚居区以本民族非遗为核心实现高密度集聚,汉族非遗仅零星分布;而汉族聚居区则呈现汉族非遗全域覆盖,少数民族非遗零星存在,非遗形成以民族聚居边界为核心的离散特征。生产方式的分异引发非遗类型化离散,农耕区域的汉族非遗以农耕技艺、节气文化为主,游牧及山地耕牧区域的少数民族非遗则聚焦游牧技艺、山地民俗,二者“生产—文化”的二元分异与空间分布高度耦合。此外,历史文化脉络的差异造就传承性离散,汉族文化核心区非遗呈现高密度、多元化特征,少数民族文化区形成独立完整的非遗传承体系,因传承路径不同形成长期空间离散;人口分布差异进一步加剧这种分化,汉族地区高人口密度推动非遗传播创新,少数民族地区低人口密度维系非遗原生形态,扩大二者类型与分布密度的差距。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说2:第二地理本性通过其独立固化作用,划定并持续强化少数民族与汉族国家级非遗的二元离散边界,维系二者离散分布的稳定性。

(三)第三地理本性

承接第一、第二地理本性的作用,以地理空间内生的关联要素作为知识与信息化时代的新地理变量。第三地理本性以人力资本、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水平、信息化程度、制度体系等为核心,在现有格局基础上,通过技术赋能、制度设计与空间力量耦合,重构非遗离散形态。空间相邻自相关与溢出效应则是第三地理本性发挥作用的基础。刘志彪等^[37]指出,第三本性是人类创造的内生要素,是新时代区域发展的关键决定因素;刘清春等^[38]明确提出,第三本性是打破第一本性地理集聚限制的根本方式,在非遗领域体现为通过制

度创新,突破自然与人文条件对非遗传播、传承的约束。

第三地理本性通过多要素协同联动,承接并优化第一、第二地理本性塑造的非遗离散格局,动态调整二元分布形态。交通与信息技术可达性的区域差异,构建起可达性、集聚与离散的梯度关联,空间相邻自相关效应进一步放大这种差异。东部高可达性区域,汉族非遗依托便利的交通与信息条件形成非遗高密度集聚圈,相邻区域的集聚效应持续巩固其优势;少数民族聚居区从前因交通闭塞、信息滞后、空间孤立,非遗虽能较好保留原生形态,却难以实现跨区域扩散,仅局限于原生地,既加剧了二元分异,也强化了核心集聚与边缘离散格局。差异化非遗保护政策定向引导非遗集聚,针对少数民族非遗的专项扶持政策,进一步强化其在聚居区的集聚特征;汉族非遗保护政策重点巩固其核心区优势,形成边界清晰的二元离散格局。区域发展战略的差异重塑了非遗的生存环境,汉族聚居区以城镇化为发展导向,非遗呈现城镇集聚、乡村衰减的发展特征。少数民族聚居区聚焦生态与文化协同保护,形成非遗原生地保护模式,使离散格局随区域发展战略调整实现动态变化。同时,空间相邻自相关与集聚效应决定了非遗的流动趋势,汉族非遗易形成规模化集聚,少数民族非遗维持原生离散状态,构成二者二元分布格局的空间基础。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第三地理本性通过多要素协同联动,重塑少数民族与汉族国家级非遗的空间离散分布格局。

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空间分布的特征

(一)数据来源与说明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是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由文化部确定并公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国务院先后于2006、2008、2011、2014和2021年公布了5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本文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数据来源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https://www.ihchina.cn/project#target1>)。通

过剔除港澳的非遗项目,并对多民族共享的项目按民族进行拆分,共有3587个有效样本。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站上公布的非遗项目名录不显示地理坐标。因此,根据研究需要,以非遗项目的申报单位所在县(市和区)行政中心对应经度和纬度作为国家级非遗项目地理位置坐标,在Google Earth上获得,样本经度范围为 $73^{\circ}33'E$ 至 $135^{\circ}05'E$,纬度范围为 $3^{\circ}51'N$ 至 $53^{\circ}33'N$ 。国家级非遗项目所在地的其他指标来自《中国2020年人口普查分县资料》。

(二)国家级非遗项目的空间分布

全国3587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汉族项目2479项,占总数的69.11%,少数民族项目1108项,占30.89%(见表1),空间分布呈现出清晰的二元分异格局,边界特征显著。

少数民族国家级非遗项目核心集聚于边疆区域,其中沿边九省区表现尤为突出。九省区整体占据绝对主导地位,除辽宁(35.06%)、甘肃(34.94%)外,其余七省区少数民族非遗项目占比均超过60%,合计承载全国72.74%的少数民族国家级非遗项目。其中,西藏少数民族非遗项目占比达99.04%(汉族项目仅1项),青海为85.06%,高原地理效应促成了高度同质化的民族文化单元;云南、广西与贵州构成少数民族非遗核心承载区,云南、广西项目占比分别为82.07%、84.29%,三省合计承载全国28.8%的少数民族国家级非遗项目,喀斯特地貌孕育了多族群共生的文化生态。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汉族国家级非遗项目集中分布于东部平原与沿海区域。汉族文化主导区,主要集聚于上海、浙江、天津、江苏等省份。长江中下游及东南沿海省份少数民族非遗项目占比普遍低于10%,其中江苏为1.86%、浙江为3.10%、广东为4.82%;华北中原核心区的汉文化主导特征更为显著,山西、山东无少数民族国家级非遗项目,河南占比仅为0.81%(见表1)。

四川、重庆、湖南、湖北四省份作为汉族与少数民族非遗项目的交汇地带,构成二元过渡区域。该区域少数民族非遗项目占比介于26.42%~47.71%,呈现出汉民族与少数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混合特

征,与当地生态环境及族群分布的过渡性高度契合。

总体而言,国家级非遗项目分布呈现三大核心特点:与胡焕庸线高度重合、边疆省份是少数民族非

遗项目的核心承载地、从边疆到内陆少数民族非遗项目占比呈阶梯式下降。这一分布特征印证了地理本性通过地形隔离、生态适应等作用,系统性塑造了国家级非遗项目的二元空间分异格局。

表 1 国家级非遗项目省级尺度分布与区域差异

地区	汉族/项	少数民族/项	少数民族比例/%	地区	汉族/项	少数民族/项	少数民族比例/%
北京	164	4	2.38	湖北	118	26	18.06
天津	46	1	2.13	湖南	89	48	35.04
河北	152	9	5.59	广东	158	8	4.82
山西	181	0	0.00	广西	11	59	84.29
内蒙古	11	95	89.62	海南	23	22	48.89
辽宁	50	27	35.06	重庆	39	14	26.42
吉林	15	40	72.73	四川	80	73	47.71
黑龙江	16	26	61.90	贵州	18	141	88.68
上海	75	1	1.32	云南	26	119	82.07
江苏	158	3	1.86	西藏	1	103	99.04
浙江	250	8	3.10	陕西	90	1	1.10
安徽	97	2	2.02	甘肃	54	29	34.94
福建	137	9	6.16	青海	13	74	85.06
江西	84	5	5.62	宁夏	10	18	64.29
山东	186	0	0.00	新疆	5	142	96.60
河南	122	1	0.81	全国	2 479	1 108	30.89

(三) 空间自相关性与集聚

受“地理学第一定律”影响,非遗呈现显著的空间自相关特征,形成“热点—冷点”集聚格局。这种集聚特征本质是“邻近效应”的体现。即一个区域的非遗会带动相邻区域非遗的生成与传播,最终在相似生态条件下形成大规模非遗集聚结构。

一般情况下,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不是独立出现的。对一个民族而言,传统音乐、传统舞蹈和民俗类非遗相辅相成,成群出现。另一方面,同一区域内多民族杂居,也会并存国家级非遗项目同时出现。重要的是,一个县域的国家级非遗项目,对地理上相邻的一个或多个县域的国家级非遗有影响,形成国家级非遗项目的集聚区域。在地理分析中,空间相邻的国家级非遗项目的相互作用较强。通常用空间自相关(spatial autocorrelation)来衡量不同空间单元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空间依赖性。空间自相关的莫兰指数(Moran's I):

$$I = \frac{N}{\sum_{i=1}^N \sum_{j=1}^N W_{ij}} \frac{\sum_{i=1}^N \sum_{j=1}^N W_{ij} (y_i - \bar{y})(y_j - \bar{y})}{\sum_{i=1}^N \sum_{j=1}^N (y_i - \bar{y})^2} \quad (1)$$

式(1)中, N 代表少数民族国家级非遗项目数, y_i 少数民族国家级非遗项目,少数民族国家级非遗项目 $y_i = 1$,汉族国家级非遗项目, $y_i = 0$; W_{ij} 为国家级非遗项目所在县(市)政府的经度和纬度计算的相邻矩阵,当项目 i 与项目 j 相邻接时 W_{ij} 为1,否则, $W_{ij} = 0$ 。图1为3 587项非遗样本单元空间相邻矩阵的可视化,矩阵维度为3 587 × 3 587(横坐标和纵坐标分别表示非遗样本数),从左上到右下呈现出一条清晰的主对角线,色点代表矩阵中非零元素,表示两个样本单元之间存在空间邻接关系,白色背景代表零元素,即无邻接关系。莫兰指数本身不能直接检验统计上的显著性,其显著性由伴随统计量 ZI 来检验:

$$ZI = \frac{I - E[I]}{\sqrt{V[I]}} \quad (2)$$

式(2)中, $E[I] = -1/(n-1)$, $V[I] = E[I^2] - E[I]^2$ 。

莫兰指数反映了国家级非遗项目存在毗邻效应,它是由国家级非遗项目空间自相关性催生集聚效应。Moran's I指数的取值范围为-1到1, $I=0$ 表示国家级非遗项目在空间上随机分布,

没有明显的聚集或离散模式; $I > 0$ 表示国家级非遗项目存在正空间自相关,即相邻的国家级非遗项目聚集在一起; $I < 0$ 表示国家级非遗项目存在负空间自相关,即国家级非遗项目彼此远离。

以样本数据计算, I 值为 0.844 7, ZI 值为 39.563 6, $M.P$ (概率)小于 0.01。这说明,国家级非遗项目存在毗邻效应,国家级非遗项目空间自相关性产生了强集聚效应。进一步,LISA (Local Indicators of Spatial Association) 方法依据空间自相关指标揭示区域内部的空间集聚或离散特征,以识别非遗项目在空间的“热点”或“冷点”区域。LISA 把空间样本分成四种区域:高高 (HH) 表示某区域自身属性值高,且其相邻区域的属性值也高,形成高值集聚区;低低 (LL) 表示某区域自身属性值低,相邻区域属性值也低,形成低值集聚区;高低 (HL) 表示某区域自身属性值高,但相邻区域属性值低,形成“孤岛”;低高 (LH) 表示某区域自身属性值低,但相邻近区域属性值高,受周边高值区域的辐射影响。以 LISA 方法划分四类国家级非遗项目样本分别为高高类为 997 项,占 27.79%;高低类为 111 项,占 3.09%;低高类为 136 项,占 3.79%;低低类为 2 343 项,占 65.32%。显然,空间自相关是由 HH 类和 LL 类构成,它们共占 93.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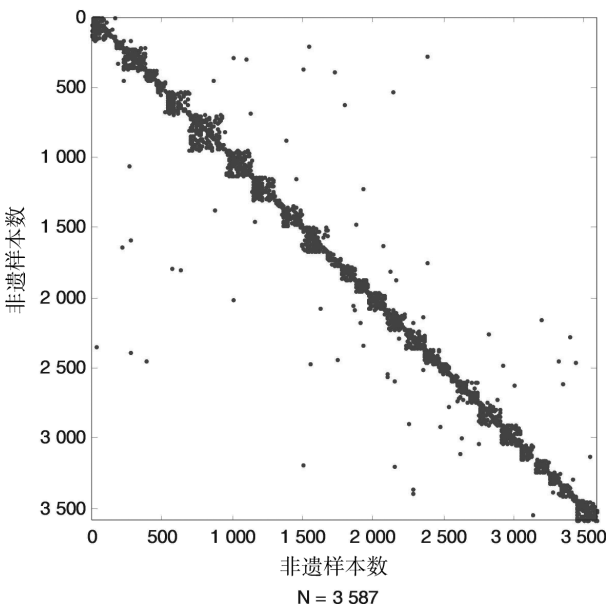


图 1 样本空间相邻矩阵

四、模型与参数估计

(一) 变量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结合地理本性理论与国家级非遗空间分布影响机制,从第一、第二、第三地理本性三个维度,选取 12 项核心变量探究非遗空间二元离散分布驱动逻辑(见表 2),所有变量均契合地理本性界定与非遗空间分布理论假说,可完整表征其对少数民族与汉族国家级非遗二元离散分布的作用逻辑。

第一地理本性为自然地理基底,选取 4 项变量奠定非遗空间分布基础格局。海拔作为核心自然地形要素,形成文化隔离屏障,塑造非遗空间隔离与集聚特征,是少数民族非遗原生性保护的关键自然基础;经度反映气候、水文、生态空间分异,影响非遗集聚与扩散,适配非遗类型分异;纬度表征区域气候带、生态系统类型,契合距离衰减效应,支撑非遗空间离散格局;离北京距离延伸先天地理区位,反映核心文化政治中心辐射差异,塑造非遗“核心—边缘”基础格局。

第二地理本性聚焦人文地理格局,选取 3 项变量放大并固化非遗二元离散分布。少数民族人口比例表征民族聚居模式,决定民族文化空间圈层分布,是驱动少数民族非遗集聚、汉族非遗广域覆盖的核心人文要素;城镇化率反映人类活动强度,推动非遗类型分异与跨区域传播;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表征区域生产方式,匹配汉、少数民族非遗类型分异。

第三地理本性聚焦内生空间关联与制度体系,选取 5 项变量重构非遗离散分布形态。空间相邻变量表征空间要素内生相互作用,反映非遗空间依赖性、近邻效应,决定其集聚与传播效率;老龄化率表征人力资本结构,影响非遗活态传承能力与传承体系稳定性,构成非遗存续的人力资本基础;文盲率表征基础教育水平,制约非遗现代传承、创新与传播,是非遗空间分布的人力资本内生约束要素;受教育年限表征人力资本质量,通过人才培养、技术赋能影响非遗保护创新,形成二元保护格局;人类发展指数表征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制约非遗保护资源投入与市场化进程,塑造二元发展路径。

表 2 变量描述表

变量	代号	含义	说明	单位
被解释变量	y_i	国家级非遗项目	$y_i = 1$, 少数民族国家级非遗项目 $y_i = 0$, 汉族国家级非遗项目	个
第一地理本性	dbj_i	离北京距离	$111.111 \sqrt{(xc_{ij} - xc_i)^2 + (yc_{ij} - yc_i)^2}$	千米
	$alti_i$	海拔	国家级非遗项目空间垂直分布	米
	$x_{c,i}$	经度	代表东西分布	度
	$y_{c,i}$	纬度	代表南北分布	度
第二地理本性	$pemr_i$	少数民族人口比例	少数民族人口与总人口之比	%
	$urbi_i$	城镇化率	城镇人口集聚水平	%
	$pipr_i$	产业结构水平	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	%
第三地理本性	$y_i W_{ij}$	空间相邻变量	W_{ij} 空间相邻矩阵	个
	llr_i	人口结构	老龄化率	%
	$illir_i$	教育水平	文盲率	%
	$yedu_i$	教育水平	受教育年限	年
	hip_i	人类发展指数	无管道自来水、无厨房、无厕所、无洗澡设施、无电梯、无家用汽车的户数占总户数比例之和	%

表 3 汇报了汉族与少数民族分组样本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统计显示,少数民族与汉族样本观测数量充足,符合大样本实证分析要求,样本具备有效性。均值特征层面,两组样本存在显著的结构性差异,相较于汉族区域,少数民族区域自然禀赋较差,区位与地形条件存在先天约束;民族空间集聚水平更高,体现了民族地区特有空间分布特征。同时,汉族区域在城镇化建设、人力资本积累、公共健康与社会发展质量方面整体优于少数民族区域。离散特征层面,少数民族组变量标准差偏大,说明民族地区内部发展异质性较强、区域分化显著,而汉族地区发展相对均衡。Jarque-Bera 检验结果表明,各组变量均未服从正态分布,数据存在尖峰偏态特征。

表 3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少数民族				汉族			
	平均值	标准差	Jarque-Bera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Jarque-Bera	样本量
y_i	1	—	—	1 108	0	—	—	2 479
dbj_i	2 024. 03	920. 88	78. 54	1 108	982. 96	572. 55	31. 44	2 479
$alti_i$	1 317. 81	1 230. 12	195. 76	1 108	251. 04	428. 95	10 181. 78	2 479
$x_{c,i}$	104. 14	12. 23	6. 66	1 108	115. 15	5. 16	670. 62	2 479
$y_{c,i}$	32. 98	7. 86	80. 05	1 108	32. 59	5. 37	43. 19	2 479
$pemr_i$	58. 30	30. 33	90. 06	1 108	4. 00	9. 68	142 064. 60	2 479
$urbi_i$	47. 04	17. 57	60. 84	1 108	63. 27	18. 21	106. 42	2 479
$pipr_i$	0. 35	0. 16	28. 61	1 108	0. 20	0. 15	154. 13	2 479
$y_i W_{ij}$	0. 89	0. 300 3	2 507. 549	1 108	0. 05	0. 23	24 548. 44	2 479
llr_i	88. 43	242. 21	38 765. 60	1 108	14. 41	3. 46	123. 05	2 479
$illir_i$	9. 71	9. 53	626. 47	1 108	3. 08	2. 58	33 386. 86	2 479
$yedu_i$	8. 33	1. 30	18. 56	1 108	9. 54	1. 22	398. 74	2 479
hip_i	64. 96	9. 92	1 940. 52	1 108	72. 12	2. 58	33 386. 86	2 479

(二) 变量相关性

理论上,国家级非遗项目的数量分布与地理本性有相关性。表 4 报告了各变量间相关系数矩阵。在地理本性的多维特征中,国家级非遗项目二元变量与距京距离、纬度呈正相关,与经度、海拔呈负相关;与少数民族人口占比、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呈显著正相关,与城镇化率呈显著负相关;与文盲率、空间相邻变量呈正相关,与受教育年限、人类发展指数、老龄化率呈负相关。其中,受教育

年限与城镇化率的相关系数高达 0. 86,呈现出高度相关性。从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大小判断,影响国家级非遗项目二元分布的核心因素为空间相邻变量,其次为少数民族人口占比,距京距离。由于二元变量中“1”表征少数民族国家级非遗项目,上述相关关系本质上揭示了少数民族国家级非遗项目空间分布在少数民族人口占比高、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大、距京距离较远、居民受教育水平偏低且空间集聚特征显著的区域。

表 4 变量相关系数

变量	y_i	dbj_i	$alti_i$	yc_i	yc_i	$pemr_i$	$urbi_i$	$pipr_i$	$y_i W_{ij}$	llr_i	$illir_i$	$yedu_i$	hip_i
y_i	1	—	—	—	—	—	—	—	—	—	—	—	—
dbj_i	0.57	1	—	—	—	—	—	—	—	—	—	—	—
$alti_i$	-0.03	0.05	1	—	—	—	—	—	—	—	—	—	—
xc_i	-0.53	-0.76	-0.02	1	—	—	—	—	—	—	—	—	—
yc_i	0.03	-0.33	-0.04	0.04	1	—	—	—	—	—	—	—	—
$pemr_i$	0.80	0.62	0.01	-0.64	-0.09	1	—	—	—	—	—	—	—
$urbi_i$	-0.38	-0.33	0.02	0.43	0.12	-0.47	1	—	—	—	—	—	—
$pipr_i$	0.42	0.22	-0.09	-0.29	0.06	0.40	-0.74	1	—	—	—	—	—
$y_i W_{ij}$	0.84	0.56	-0.03	-0.52	0.06	0.79	-0.38	0.42	1	—	—	—	—
llr_i	-0.38	-0.54	0.00	0.55	0.15	-0.47	0.10	-0.02	-0.38	1	—	—	—
$illir_i$	0.47	0.42	0.05	-0.49	-0.18	0.64	-0.53	0.32	0.47	-0.41	1	—	—
$yedu_i$	-0.41	-0.43	-0.01	0.40	0.28	-0.51	0.86	-0.62	-0.40	0.22	-0.71	1	—
hip_i	-0.40	-0.26	0.00	0.33	-0.11	-0.46	0.59	-0.58	-0.41	0.22	-0.61	0.61	1

(三)模型

我国的汉族和少数民族国家级非遗项目在空间分布表现出二元离散分布特点。相关性仅是分析单因素作用,在众多因素共同作用的模式下,有的因素显著性并不定一一显现。因此,在相关性分析的基础上还将多变量间的相关关系转化为因果计量模型,进行回归分析,进一步对国家级非遗项目二元分布的决定因素进行回归分析。

二元离散选择模型是分析二分类变量时常用的非线性统计模型,其中,Logistic 回归模型是最重要且应用最广泛的非线性模型之一。Logistic 模型,也被称为逻辑回归模型,是一种具有罗吉斯蒂克函数形式的非线性模型:

$$y_i = \beta_0 / [1 + \beta_1 \exp(\beta_n x_{ni})] + \varepsilon_i \quad (3)$$

式(3)中, y_i 是被解释变量, x_i 表示影响 y_i 分布的因子变量($i=1,2,\cdots,N$), β_0 、 β_1 和 β_n 是模型参数, ε_i 是误差项。先考察地理位置效应对我国国家级非遗项目二元离散分布的影响,Logistics 回归模型:

$$y_i = \beta_0 + \beta_1 y_i W_{ij} + \beta_2 dBJ_i + \beta_3 alti_i + \beta_4 xc_i + \beta_5 yc_i + \varepsilon_i \quad (4)$$

式(4)中, y_i 表示取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对应少数民族国家级非遗项目; y_i 取值为 1,对应汉族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y_i 取值为 0。 y_i 的 0 和 1 取值代表汉族和少数民族国家级非遗项目的二元离散分布; $y_i W_{ij}$ 国家级非遗项目的空间相邻变量; N 是样本量。为了检验空间

变量稳健性,在式(4)引入其他地理本性变量后得到模型:

$$y_i = \beta_0 + \beta_1 y_i W_{ij} + \beta_2 dBJ_i + \beta_3 alti_i + \beta_4 xc_i + \beta_5 yc_i + \beta_6 rpem_i + \beta_7 ur_i + \beta_8 pipr_i + \beta_9 llr_i + \beta_{10} illir_i + \beta_{11} yedu_i + \beta_{12} HIP_i + \varepsilon_i \quad (5)$$

式(5)中, β_0 为截距, $\beta_2 - \beta_5$ 为表 1 中第一地理本性变量的边际贡献, $\beta_6 - \beta_8$ 为第二地理本性变量的边际贡献, β_1 和 $\beta_9 - \beta_{12}$ 为第三地理本性变量的边际贡献。

(四)参数估计

对于二元响应变量,在 Logistic 模型的参数进行极大似然估计(ML)。表 5 为以牛顿—拉夫逊法(Newton-Raphson)对式(4)估计的结果。①为空间变量的参数估计,从 t 统计量值看, $alti_i$ 在 5% 水平上不显著, $y_i W_{ij}$ 的显著性最强。②为在①中剔除 $alti_i$ 后的估计结果, $y_i W_{ij}$ 的显著性最强,其次是离北京的距离,经度和纬度的显著相当,都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③为在②中加入其它地理本性变量后对式(5)再估计后所得,其中 xc_i 、 llr_i 、 $illir_i$ 和 $yedur_i$ 在 5% 水平上不显。④为先剔除③中除截距项外, z 值小于 2,5% 的显著性水平上不显著变量后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 hip_i 变为 5% 的显著性水平上不显著。⑤一步剔除④中的 hip_i 后剩余变量都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其中 $y_i W_{ij}$ 的显著性仍最强,其次是 $pemr_i$, $pipr_i$ 显著性最弱。对比⑤和②,⑤ R^2 值有所上升,AIC 值有所下降,⑤优于②,是较适合的模型。

表5 Logistic 模型参数的 ML (牛顿—拉夫逊) 估计

变量	y_i									
	(1)		(2)		(3)		(4)		(5)	
	β 值	z 值	β 值	z 值	β 值	z 值	β 值	z 值	值	z 值
c	-1.113 9	-0.802 9	-1.204 3	-0.869 8	-4.729 4	-1.805 0	-5.102 2	-3.619 6	-6.928 0	-11.998 7
$y_i W_{ij}$	4.051 6	27.105 8	4.065 7	27.255 3	2.616 8	14.543 5	2.633 6	14.806 5	2.641 7	14.855 4
dbj_i	0.001 4	7.821 9	0.001 3	7.766 5	0.000 9	5.011 0	0.000 9	5.666 8	0.000 9	5.606 5
$alti_i$	-0.000 1	-1.511 9	—	—	—	—	—	—	—	—
$x_{c,i}$	-0.047 8	-4.359 9	-0.047 2	-4.323 1	0.002 4	0.177 7	—	—	—	—
$y_{c,i}$	0.064 2	4.714 3	0.063 3	4.678 0	0.043 8	2.855 4	0.057 7	4.105 0	0.062 6	4.564 0
$pemr_i$	—	—	—	—	0.055 5	13.364 1	0.052 7	13.737 2	0.053 1	13.881 1
llr_i	—	—	—	—	-0.000 3	-0.009 6	—	—	—	—
$urbi_i$	—	—	—	—	0.015 4	1.430 8	—	—	—	—
$pipr_i$	—	—	—	—	2.076 9	2.497 8	1.181 1	1.867 0	1.732 9	3.515 4
$illir_i$	—	—	—	—	-0.021 8	-0.721 8	—	—	—	—
$yedur_{?i}$	—	—	—	—	-0.039 4	-0.229 6	—	—	—	—
hip_i	—	—	—	—	-0.034 5	-2.049 8	-0.021 8	-1.408 5	—	—
ε_i	$\varepsilon_{i,1}$	$\varepsilon_{i,2}$	$\varepsilon_{i,3}$	$\varepsilon_{i,4}$	$\varepsilon_{i,5}$					
R^2	0.651 6		0.651 1		0.715 9		0.714 6		0.714 1	
AIC	0.433 9		0.434 1		0.357 8		0.355 8		0.356 7	
LR	2 890.321		2 887.999		3 175.368		3 169.344		3 167.362	
Prob	0		0		0		0		0	
Obs	ObswithDep = 0		2 479		Totalobs		3 587			
	ObswithDep = 1		1 108							

从表5中(5)的估计结果来看,非遗空间分布形态受由多重地理本性因子协同耦合,形成典型的非线性重构机制。空间邻近性发挥正向集聚作用,催生地域文化共鸣,构建稳固的内生传承体系,促使非遗呈现局部集聚的空间特征。北京文化中心辐射能力随空间距离逐步衰减,让边疆地域形成相对封闭独立的文化圈层,有效保留了少数民族非遗的原生特质。纬度差异塑造的自然地理基底,适配高纬地区少数民族游牧、渔猎的传统生产模式,为本土非遗资源存续积淀提供稳固的自然支撑。同时,少数民族人口集聚格局叠加非遗专项扶持政策,有效夯实非遗代际传承的核心载体。除此之外,第一产业就业占比偏高的民族地区,受城镇化、工业化发展冲击相对小,完整留存传统农业生产场景,与非遗原生技艺体系、传承发展逻辑高度契合。可见,空间集聚、自然基底、民族人文、生产方式等多元本底要素联动互补、协同赋能,共同塑造了国家级非遗的二元空间分布格局。

五、结论与含义

我国汉族与少数民族国家级非遗呈现边界清晰、集聚规律鲜明的二元离散空间分布特征。这

一格局并非偶然,而是三重地理本性协同作用与国家非遗保护政策调控的结果,更是自然地理约束、人文历史演进与国家文化战略导向的深度耦合。其中,汉族国家级非遗主要集中于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等自然条件优越、农耕文明深厚的区域,以江苏、浙江、京津冀为核心形成大集聚格局,且多沿交通干线、城市节点布局,契合汉族农耕文明传播路径与人口集聚规律。少数民族国家级非遗则集聚于西南、西北沿边地域,与当地地形、气候及民族生产生活方式深度绑定。

实证结果进一步验证,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呈现显著的汉族与少数民族二元离散空间格局,该特征根植于地理本性深层驱动,由五大核心因素协同塑造并强化。其一,空间邻近性催生文化集聚,构成二元离散格局的集聚基础。地理空间自相关性驱动相近地域形成互助内生机制,推动非遗连片集聚,奠定格局空间根基。其二,中心—外围空间层级差异强化区域分异,凸显二元格局。北京中心辐射效应随距离衰减,边疆封闭文化圈层为少数民族非遗原生形态提供保障,扩大区域非遗分布异质性,强化二元离散特征。其三,纬度主导的自然本底筛选强化格局偏向性。纬度决定

的自然禀赋与少数民族传统生产方式高度适配,使非遗呈现显著高纬度偏向,加剧离散态势。其四,民族聚居格局夯实人文传承基底。少数民族聚居为非遗代际传递提供稳定载体,与非遗分布高度耦合,巩固二元格局稳定性。其五,传统生产方式支撑格局长期存续。第一产业主导区域保留传统场景,契合非遗本源,维系非遗与地理环境的绑定,为格局存续提供支撑。此外,国家非遗保护政策作为第三地理本性的重要制度延伸,通过对少数民族地区实施倾斜性支持,有效弥补其非遗保护与传承的资源短板。数据显示,少数民族每百万人口非遗拥有量达汉族的 4.6 倍,在保障少数民族非遗活态传承的前提下,进一步固化并凸显我国非遗汉族与少数民族二元离散的空间分布格局,实现文化多样性维系与非遗传承质量提升的双重目标。

汉族与少数民族国家级非遗的二元离散格局,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三重不可替代的意义,为新时代文化保护与民族团结提供重要支撑。

第一,筑牢文化多样性的制度根基与空间载体。二元离散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生态的空间映射。尽管汉、少数民族非遗地域分隔明显,但二者并非割裂,共同构成中华文化完整谱系,承载各民族历史记忆与文化基因。国家非遗保护政策的倾斜支持,并非简单资源均衡,而是通过制度设计将少数民族地方知识、特色文化纳入国家文化体系,推动其从民族符号升华为国家标识,实现文化多样性与国家统一性的辩证统一,为铸牢共同体意识奠定坚实文化基础。

第二,搭建铸牢共同体意识的文化纽带与交流桥梁。国家非遗保护政策打破地理隔离对少数民族非遗传承的制约,通过资金扶持、传承人培养、数字化保护等举措,推动其走出地域局限,实现跨区域、跨民族交流互鉴。这种以保护为基础、传承为核心、交流为延伸的良性循环,让各民族在了解、欣赏彼此非遗的过程中,深刻感知中华文化的包容性与整体性,构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心理认同,消解空间离散带来的文化隔阂,增强民

族文化认同。

第三,探索多元一体格局的实践路径与实现形式。非遗保护政策既规避工业化、城镇化对传统文化的同质化冲击,又依托非遗产业带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增收、民生改善,形成文化保护、经济增收与认同增强的正向循环,实现文化传承与经济发展协同推进。云南民族村非遗展示、丽江非遗旅游融合、跨区域非遗展演等案例,推动非遗从地域独存走向空间互嵌,让二元离散格局向多元共生、协同发展转型,为民族团结筑牢文化根基,也为铸牢共同体意识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总之,汉族、少数民族国家级非遗的二元离散分布,是自然历史演进的客观结果、地理本性长期作用的必然产物,更是国家文化战略主动塑造的成果。我国非遗保护制度不仅破解了少数民族非遗传承困境、维系了文化多样性,更以文化认同为核心,将非遗打造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载体,推动各民族在文化传承中凝聚共识、增进认同、协同发展,为民族复兴注入强大文化力量。

参考文献:

- [1] 黑格尔. 历史哲学[M]. 王造时,译.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82.
- [2] 顾颉刚. 顾颉刚自传[M]. 北京:中华书局,2019:328.
- [3] 习近平. 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EB/OL]. (2019-09-27)[2025-12-10].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45814662663164355&wfr=spider&for=pc>.
- [4] 习近平. 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的讲话[EB/OL]. (2019-08-19)[2025-10-12]. https://www.gov.cn/xinwen/2020-01/31/content_5473371.htm.
- [5] 陆尧. 让少数民族文化特色在利用中更加鲜亮[EB/OL]. (2025-05-30)[2025-11-15]. <http://cpc.people.com.cn/n1/2025/0530/c64387-40490937.html>.
- [6] 马翀炜. 知识谱系的构建与人类智慧的分享:聚焦中国边境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J]. 思想战线,2019,45(4):22-32.
- [7] 程乾,凌素培.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J]. 地理科学,2013,33(10):1166-1172.
- [8] 徐柏翠,潘竟虎. 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J]. 经济地理,2018,38(5):

188-196.

[9]张舟,王仲智,林柄全,等.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分布特征与影响因素[J].资源开发与市场,2023,39(8):949-956.

[10]邓凯,杨灿灿.安徽省国家级与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子研究[J].滁州学院学报,2018,20(5):7-12.

[11]李继晓,艾雯,张国霞.青海省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结构及地理空间分布特征[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1(5):80-87.

[12]张芳芳,刘旭玲,高自敞.新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及影响因素研究[J].市场研究,2019(11):12-14.

[13]应奎,李旭东.贵州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J].湖南师范大学自然科学学报,2021,44(5):70-79.

[14]王磊,李涛,刘志林.黄河流域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分布特征与保护策略[J].经济地理,2023,43(2):229-237.

[15]王红,赵玥玥,甘晓静.长江流域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时空分布特征[J].地理空间信息,2023,21(11):81-85.

[16]朱少锋.长三角地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分布特征研究[J].城市建筑,2024,21(12):72-75,112.

[17]焦敏,路璐,李天宇,等.大运河文化带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J].浙江大学学报(理学版),2025,52(5):591-604.

[18]梅大伟,王艺洁,孙诺希,等.大运河文化带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J/OL].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1-12[2025-09-17].
https://link.cnki.net/urlid/41.1429.c.20250917.1036.004.

[19]甘晓静,王红,于兴修,等.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流域特征分析[J].自然资源信息化,2023(5):23-31.

[20]李军阳,李小惠.国家级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特征分析[J].文体用品与科技,2013(13):6-7.

[21]李斌,李兴平,李小艳.国家级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J].辽宁体育科技,2017,39(4):96-100.

[22]代刚,郭育竹.国家区域重大发展战略下中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区域空间分异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006—2021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实证[J].中国体育科技,2025,61(4):84-97.

[23]邱族周,钱惠,李薇,等.国家级传统美术类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J].装饰,2023(6):133-135.

[24]鄢慧丽,王雅茜,熊浩,等.国家级民俗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J].西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1,57(4):101-109.

[25]余聿莹.我国少数民族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空间分布研究[J].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学报,2020,33(1):31-34.

[26]苏勇军,乐张丽.浙江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J].浙江档案,2021(8):39-43.

[27]郭宇,姚亦锋,鄢继尧,等.中国五批3610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分布数据集[J].全球变化数据学报,2022,6(2):257-264.

[28]李嘉欣,王振波.国家级非遗项目空间分布及谱系年代研究[J].地理学报,2022,77(12):3162-3179.

[29]李晓婧,乔良,刘冉,等.基于百度指数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网络关注度研究[J].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25,41(5):58-68.

[30]张克新,汪田归,赵莉,等.基于地理探测器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研究[J].信阳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5,38(4):450-458.

[31]章永林.中国东北地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时空分布特征[J].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51(6):123-130,144.

[32]田玉霞,谢霞,田晓霞.新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J].新疆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0,37(3):362-369.

[33]KRUGMAN P. Firstnature, secondnature, andmetropolitanlocation[J]. Journalofregionalscience, 1991, 33(2):129-144.

[34]夏海斌,王铮.中国大陆空间结构分异的进化[J].地理研究,2012,31(12):2123-2138.

[35]吴福象,王兵.“自然”本性、“一带一路”建设与供应链地理重塑[J].南京社会科学,2021(1):1-10.

[36]李锦,周妮,罗娜娜.青藏高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J].中国藏学,2025(1):1-11.

[37]刘志彪,刘俊哲.区域市场一体化: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重要推进器[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1):103-111.

[38]刘清春,王铮.中国区域经济差异形成的三次地理要素[J].地理研究,2009,28(2):430-440.